

## 我记忆中的 1985 年“方法论热”

朱立元

在新时期文艺学探索和发展史上,1985年的“方法论热”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这一代学人对80年代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情结。这首先可能因为那个年代离学术凋零、万马齐喑的“文革”还很近,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引导我们冲破长期以来形成惯性的重重理论学术禁区,激发起我们巨大的学术创造激情,面对这样一种反差如此强烈的情境,那个特殊的岁月怎么可能不镌刻进我们的心灵深处呢?整个80年代,文艺理论界所开展的一场场的学术争鸣和讨论接踵而至,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形象思维和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争鸣,到“文学主体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可以说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热闹非凡,那种为了追求真理而不畏权威、敢于畅所欲言说真话的精神形成良好的学术气氛,人们长期期待而不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局面终于出现了,这又怎么能不叫人久久难以忘怀呢?而其中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变革大讨论的情境,尤其深深地沉淀进我的文化记忆之中,每每想起,心里都会激起阵阵波澜。下面,我试图作为80年代文艺理论发展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描述一下我记忆中的“方法论热”,这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但我相信,它可能也会具有那一代学人的某些共同性。

在同代人中,我属于较早且较热心地提倡文艺学美学“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化”,呼吁方法论变革的学者之一。当时,我刚刚从复旦文艺学专业硕士毕业不久,是一个初进学界的新人,一方面顾虑较少,一方面求新意识较强,所以,对新方法论的新潮,我举双手欢迎。记得那时我积极地寻找、翻译、引介国外文论、美学及方法论方面的论著,譬如译介英伽登《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合作主编并参与撰写《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等<sup>①</sup>。而且,我自己也积极撰文,几乎全程、深度参与了这场方法论的大讨论(注:参阅朱立元:《力促文艺学的现代化》,《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1期;《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开放:内在机制的需求》,《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因此,对讨论的进展、得失等感受尤深。

在我看来,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与当时学界热心组织了以“文艺学方法论”为中心议题的一系列全国性学术会议密切相关。记得仅1985年就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研讨会:3月在桂林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是以文论研究方法更新和多样化问题为核心的;同月在厦门举行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则以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关系问题为主题;4月在扬州举行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文艺学方法论与老、新三论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结构、层次、体系等问题;10月在武汉举行的“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文艺学方法论与系统科学方法论及与文艺观念、文艺本体的关系等问题。1985年这一系列会议营造、烘托了研究方法变革的浓厚氛围,促成了一种倒逼学界认真思考方法论变革的强大力量,显然对“方法论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把1985年称为“方法论年”确实是名至实归。

这场讨论涉及的面很广、问题很多。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也比较有兴趣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合理性的讨论。

这场文艺学的方法论讨论最初是从借鉴“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始的,重点研讨自然科学方法论如何应用于文艺学美学研究以及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后来才转向大力引进、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文论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何以如此?在我印象里,学界寻求研究方法的更新,首先需要找一个突破口。由于“文革”大批判刚刚过去,直接借鉴当代西方文论当时还属于比较敏感的问题,有时候思想上还心有余悸;而借鉴自然科学方

法,在学术界不但不存在任何思想障碍,而且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科学的春天”等号召后,1980年《哲学研究》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981年《哲学研究》编辑部还出版了《科学方法论文集》,大力号召“从事哲学、逻辑学、科学史、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科学方法论”,“积极开展方法论的研究”<sup>(2)</sup>。这直接激发了文艺理论界把新、老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引进和借用作为突破口。一时间,探讨自然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美学之方法论的关系问题的文章大量问世;《当代文艺思潮》《读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报》等重要报刊,都不约而同开辟了“文艺学与现代科学”“文艺学与自然科学”“文艺学、美学与其他学科”等专栏集中讨论方法论的变革问题;还先后出版了陶同《当代科学与美的变革》、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金克木《艺术科学丛谈》、张相轮、凌继尧《科技之光——科技美学概论》、杨春时《系统美学》等一批应用老、新三论研究文艺学美学、尝试将自然科学文学化、美学化著作<sup>(3)</sup>,可见热度之高。

在讨论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学、美学研究虽然与自然科学不同,但作为人文科学,应当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变革、丰富和发展自身,应当持欢迎、肯定和宽容的态度,至少持审慎、不反对的态度;而另一种则认为二者分属认识与价值(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性质迥异,不应当搅和在一起,因而反对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当时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首先应当大胆、积极地尝试,对那些勇于尝试、但开始阶段比较粗疏或者有些生硬的应用,不应当反对或者嘲笑,而应当鼓励尝试者继续努力,争取成功。后来部分学者的尝试实践证明,自然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美学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相似、相通、相契合之处。如果以文艺学美学为本,积极但有选择性地、合理地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方法论,且最终也

落脚于解决单靠文艺学美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为借鉴、引进而借鉴、引进,盲目地滥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就有可能变革、更新和充实、丰富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系统。

据此,我认为,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无原则、无选择地引进或故步自封、完全拒斥借鉴,两者都是不可取的。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兴宅的《艺术魅力的探寻》一书,其中用系统论方法重新研究鲁迅小说《阿Q正传》,在文艺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我开始时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认为是用系统论研究文学作品的成功尝试。这也是促使我积极支持文艺学美学借鉴、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后来,看法有所改变,觉得文章在系统论框架下对《阿Q正传》所做的研究,虽然比以往相关的研究更加系统、完整,但好像缺乏深度的推进,似乎不用系统论方法也有可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是我那时内心的想法,现在说出来可能对兴宅老师有不敬。但是,我并不否定,而且充分肯定兴宅老师在应用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学者中是先行者和佼佼者,起到了很大作用,使许多对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学抱有怀疑的人改变了态度,也使我坚定了上述的支持态度。

至此,方法论热中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争论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关于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公正、辩证的评价的讨论。

我作为过来人,虽然竭力支持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变革和更新,但自己应用新方法论的尝试和实践并不多,不过,我目睹了许多大胆应用文艺学新方法论的尝试者和弄潮儿,觉得他们的尝试虽然不能说都很成功,有的甚至不太成功,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不应该以少数不成功的例子来否定整个方法论变革和更新的时代潮流,所以我同意多数学者观点,即认为文艺学美学新方法论探索和尝试有利于整体地、纵深地、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复杂文艺学美学现象和规律,有利于文学研究思维、心理空间的拓展以及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的

多样化,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

当然,我并不否定“方法论热”中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在引进新方法时往往忽视新方法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文艺学美学本身的特殊性而造成“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也可以批评,但是不应该过头。我看到,早在80年代就有一些文章严厉批评某些新方法(不限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尝试是“生吞活剥”“新瓶装旧酒”“牛头不对马嘴”等,甚至指责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乱象。我不否认这些批评中有某些合理因素,也是有一些实际例证的,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汲取教训。但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以个别例证来否定整体,以局部缺点而否定全局,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回到当时的整体历史语境中,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审视和评价这场“方法论热”,既不能一味地拔高,更不能一味地贬低,甚至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所以,我当时就撰文,认为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看,新方法引进和运用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是文艺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股新方法论思潮的二律背反复杂运动中的更新和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应当看到的是,它们两者“都参与了思维方式的局部变革,冲击了仍然广泛束缚人们意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开拓了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丰富、发展了辩证思维的视野,推动、并将继续推动文艺科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sup>(4)</sup>。可惜,这个看法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在“方法论热”高潮过去以后,还常常听到方法论变革是“全盘西化”“换汤不换药”“新名词、新术语狂轰滥炸”等尖刻的指责。但是,我的上述态度不仅80年代,而且至今没有改变。1990年蒋孔阳先生与我合写的《八十年代中国美学研究一瞥》,对包括“方法论热”在内的文艺学美学当时的研究状况做出了我以为至今依然没有过时的整体判断:即认为“八十年代”是“值得骄傲和怀念的十年”,“值得大书特书的十年”,“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十年”。(注:蒋孔阳、朱立元:《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6期)

第三,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变革与文艺观念变革两者关系的讨论。

表明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不是一个真问题,或者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当时,人们(包括笔者在内)对这个到来的太迅猛的方法论热也许思想准备还不充分,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从那时命名“方法论年”与“观念年”究竟应该何者在先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就可见一斑。关于

这个命名,据查阅有关资料,当时就有学者将1985年称为“方法论年”(注:如钱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后来有亲历者的回忆,也是将1985年命名为“方法论年”,而将1986年命名为“观念年”(注:杜书瀛《理论的脚步》,《文艺争鸣》2013年第5期;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而据笔者回忆,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则是“观念年”,这个命名好像是由杨春时教授在1986年一次会议上提出,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不过,也存在不同意见,如钱学森承认,当时文艺理论界流行着1985年是“方法论年”以及1986年是“观念年”之说法,但他本人从观念比方法更重要的意义上认为,1985年应当是“观念年”,然后才是“方法论讨论”。(注: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由此可见,多数人认可先有方法论变革、后有观念变革的说法,其中也暗含着认为方法论变革为观念变革准备条件的看法。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和单向的,而是复杂得多。

回顾起来,“方法论热”并不是只发生在1985年,而这个命名只不过表明那一年是“方法论热”的“大年”、高峰年和承上启下的一年。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方法论“热”的形成是有一个酝酿、准备过程的。这个过程,不纯粹是方法论层面的,而首先是思想观念层面的。

新时期初,文艺学美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文艺的“阶级斗争”工具论、“从属论”观念被否定、清理与矫正,党中央正式宣布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开始回归自身的审美本性。

二是更重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念从被批判、压制和遮蔽中逐渐解放出来,“文学是人学”观念得以重新确立。学界突破理论禁区,展开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仅1978—1982年,就发表论文近500篇,其中文学、美学方面的文章过半。当时,大量以关注人、关注人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呼唤着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支持;学界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热”直接引发了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和争论;特别是钱谷融先生1957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和主张,80年代初在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界又重新引起广泛共鸣和支持,确认了人在文学

里的中心地位,将描写人和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文学的基本要求,确立了文学的人学基础。

与此同时,方法论层面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独断论”“机械论”等方法逐渐被批判、突破和超越。而且,思想的解放,引起了学界思考,如何在研究方法上实行变革创新,以跟上理论观念的变革;同时,开始跳出文艺学美学学科自身的范围,向其他兄弟学科寻找可以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于是,如前所述,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大量方法论被关注并引入文艺学美学领域,直接激发了方法论变革的内在需求。

现在回到前面方法论年与观念年何者为先的问题,就有答案了:这两个层面,“观念层面”显然更为基础和根本。新时期初文艺学美学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方法论热”是在文艺学美学及其批评观念的艰难潜变和不断更替基础上发生和展开的,观念变革内在的导向和催生文艺学美学方法论革新,尤其是跨领域、跨学科,全面化而多样化的方法论借鉴和创新,因此,观念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方法论热”的历史趋向。当然,这只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方法论变革对观念变革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事实上,“方法论热”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观念层面”的革新和发展,而且,方法论变革本身,就意味着并敞开为一种新视野和新观念,二者共同构成和呈现这一变革的基本样貌。比如1985年前后,刘再复率先发表了《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等多篇思考文艺学方法论的文章,<sup>(5)</sup>紧接着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理论观念(注: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随后学界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也即是关于文艺本质观念的论争。就此事件而言,方法论的变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打了“前哨战”,助推了“观念层面”的革新和发展。

总体说来,文艺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观念(包括文艺思维方式)的更新和变革是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其中观念更新更为基本。观念的突破,为文艺学研究(包括方法论)的整体推进和突破创新清理出了必要的场地,提供相关性、必要性的逻辑依据和理论基础;而反过来,文艺学方法的更新和变革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预示甚至促进文艺学观念的丰富、发展和进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动相融的。

我之所以对“方法论热”情有独钟,一方面是看到它顺应、符合了其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整体变革、转型的必然趋势,认识到它不仅仅是文艺学研究方法上的变革,而且是中国学术界走出“文革”阴影、冲破理论

禁区 and 束缚后的第一次学术思想的大解放,是中西文艺学界沟通理解、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第一步,也是中国文艺学激活创新思维的必由之路,其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也切实体会到,那是一代学人艰辛求索和不断创新建构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在深层次上营造着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的基本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孕育、规约着其后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可能态势及走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曾经那么深地激荡、构筑、拓展着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心灵、精神、观念等,它潜移默化地形塑和生成了他们的现代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品格,重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话语谱系,使他们及后来者有可能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做出更重要的贡献。这是我和同时代一大批学人的共同心声和真实体验。

2018年7月底初稿

注释: -----

- (1)《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在80年代中期基础上陆续翻译了《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尧斯的《审美经验论》(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布鲁姆的《误读图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2年版)等。
- (2)《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 (3)陶同《当代科学与美的变革》(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黄海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金克木《艺术科学丛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张相轮、凌继尧《科技之光——科技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春时《系统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徐纪敏《科学美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济生《系统进化论美学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 (4)朱立元:《对文艺学方法论更新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 (5)如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年第2、3期)、《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1985年7月8日《文汇报》“文艺百家”版)、《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1985年8月31日《文艺报》)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明彦)